

CRITICS



唤醒批评

梁静 著

非外借



!

新锐批评家丛书

唤醒批评

梁静 〇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唤醒批评 / 梁静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378-5093-3

I. ①唤… II. ①梁…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0491 号

书 名: 唤醒批评

著 者: 梁 静

责任编辑: 范 戈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0351-5628692 (编辑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h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71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093-3

定 价: 49.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让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杜学文

近年来，山西更年轻的一批评论家成长起来，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总体上看，这批评论家的分布比较合理。除了在省城工作的人外，还有一些人工作在市县各地；从数量上来说，高校的同志比较多，但仍然有很多人工作在其他部门，如媒体、刊物及一些并非文化机构的单位。从他们接受的教育情况来说，一些人的学习经历比较丰富，其中有博士、博士后，教授、副教授，也有本来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凭个人的热爱、努力走上了批评的道路。从目前的成就来看，也比较乐观。有的人成为国家性评奖活动的评委，有的作品被权威性刊物选载，有的已经出版了几部著作。虽然人数还不够多，但基本呈现出代际承接的局面，为山西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条件。为使更多的批评人才涌现出来，山西省作家协会在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决定编辑出版“新锐批评家丛书”。此次通过一系列申报、评审等程序，先行资助十位评论家，帮助他们出版自己的著作。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能够涌现出来，使我们的文学批评更加生龙活虎、有声有色。

山西文学有着深厚的传统。这已是有目共睹。实际上，山西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择其要者言，如战国时期的荀子就著有《乐论》，强调音乐在教化中的巨大作用，是比较早地对艺术进行理论总结的经典著作。在绘画理论方面，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对中国绘画理论与发展史的一次系统总结，被誉为“画史之祖”，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经典。宋代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丰富了美术史论结合的研究领域，影响广泛。在书法理论与批评方面，传为卫铄所著之《笔阵图》、张彦远编著的《法书要录》等在中国书法理论的构建方面贡献

至大。在文学理论的创建上，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白居易在强调诗文之社会功能的同时，强调诗的情感、语言、形神等问题。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倡导自然，主张性情之真，推崇雄劲豪放之风，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诗论。特别是晚唐时期司空图所著《二十四诗品》，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成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山西地区的文艺理论建设也随时代之变而变。高长虹身体力行倡导“狂飙运动”，有许多关于文艺的理论表述。特别是李健吾，是当时极为活跃的批评家。后来的常风也著有多部批评著作。与此相应的是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活动，山西得天独厚。这里不仅聚集了大量的文艺人才，创作了大量的新文艺作品，也发表了许多关于文艺的理论见解。尤其要提到的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根据地作家，不仅是最早体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创作群体，在文艺理论的建设上亦多有成就。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山西的文学创作，也对新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我们在此谈论这些，主要是说，作为地域文化现象，山西一直以来是一个创作与理论评论齐头并进的地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对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变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进入当代，山西的文学理论与评论仍然保持了比较活跃的态势。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可谓阵容强大。仅山西省作家协会机关就有老中青三代十余名评论家。此外，在高校也有许多人从事文艺理论与评论。除了这两部分人之外，还有在媒体报刊及社会各类机构工作的人也同样活跃。有人认为这三批人成作协派、学院派、报刊派三分天下之势。除了在太原工作者外，亦有吕梁师专群体、晋东南师专群体等。他们在文学流派研究、鲁迅研究、文艺生产力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根据地文学研究，以及追踪创作等方面在全国均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人或调离，或退休，或转行，或去世，业者星散，群体不再，山西文学理论与评论队伍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是理论评论阵地的萎缩。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评论刊物《批评家》等或停刊，或改变编辑方向。新人的成长、氛围的营造、作品的刊发、活动的开展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影响。所幸的是，在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山西省作家协会一直坚持发现新人，扶持新人，新一批评论家又涌现出来。他们年龄较小，思维活跃，知识结构新颖，对新现象、新趋势比较敏感，个性色彩极强，表现出活色生香的发展态势。这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改

善了山西文学批评弱化的倾向，对山西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是一项艰难而清苦的事业，但同时又是一项崇高而不可或缺的事业。没有理论的行动是盲目的，没有批评的创作是孤寂的。我们的创作亟需强有力的理论与批评的支撑。这就对批评工作者提出了非常急迫的要求。我以为更加需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要在了解掌握现代文艺理论的同时，很好地了解掌握中国古典文论的精华，并在实践中将这二者很好地融合起来。现在，人们讨论比较多的是外来的文艺理论，似乎不谈这些就有落伍、老土之嫌。但是，对本民族的文艺理论却表现出疏离、隔膜的状态。这是有问题的。文化的进步肯定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纳、交流形成的。只拘泥于传统而不求新变是不行的。但是只知道别人而不清楚自己则更危险。正确的方法是在掌握传统的同时积极借鉴吸收别人的与我有利的元素，才能形成新的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以中国传统绘画言，在隋唐时期，由于输入了西域的晕染法及其他外来技法，使中国绘画发生了新变，形成了新的风格。如果没有之前的中国传统绘画，就不可能使外来技法有生长的根基土壤。但是，如果不吸纳西域的画法，中国传统绘画就不可能在隋唐时期发生改变，就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变得僵化，失去鲜活的生命力。反过来看，因为吸收了中国文学的元素，也使国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新的生机。如美国著名的现代派诗人、批评家艾兹拉·庞德，他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中受到极大启发，形成了“意象理论”，并据此倡导意象派诗歌运动，开英美现代诗歌之先河，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但是，著名的艾兹拉·庞德并不是在写中国的古典诗词，而仅仅是接受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成分。这就是说，任何新变都是对外来有益因素的接受与改造，而不是照搬。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经过十五年的研究后，发现找不到能够有力地支持自己结论的人类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荣格遇到了德国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卫礼贤把自己翻译介绍的中国道教经典《太乙金华宗旨》给了荣格，使荣格摆脱了研究的困境。用荣格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部著作帮助他“第一次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古典文化典籍使荣格从迷茫中出走，并成就了荣格。但是，荣格并不是一个文化偏至主义者，仍然保持了对文化融合的清醒认识。他指出，“中国花了几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偷窃来获得。要想拥有，我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东方所能给予我们的仅仅

是一种帮助，具体工作还必须我们来做。如果我们把自己文化的根基当作过时的错误加以舍弃，把我们看成无家可归的海盗偷偷摸摸地栖身于陌生的海岸上，那么，《奥义书》的智慧和瑜伽的洞见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带着习惯性的偏见过着人为安排的生活……那么东方的洞见尤其是《易经》的智慧将毫无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外来的，特别是西方的理论蜂拥而入，对既有的理论模式形成了冲击。一方面这些新传入的理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拓展了表达的空间，丰富了文学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食而不化、机械套用、简单照搬的问题，存在着片面回避或否定传统的问题。这使我们的文学表现出疏离民族文化的同质化倾向，将使文学面临僵化并失去根基、失去生气的挑战。借用荣格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把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当作过时的错误舍弃，那么，外来的理论即使多么富有智慧，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论，并借鉴外来文论中那些能够解决创作现实问题，唤醒文学新的生命力的元素，并使之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推动文学发展进步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与方法。

二是要在进行文学本体批评的同时努力发现文学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文学批评当然是对文学的批评，首先要建立在对文学作品本体的研究上。如果脱离文本，批评也就无从下手，就将成为没有文学的所谓的“文学批评”。这当然是不行的。因此，我们首先要熟悉文本，对文本有充分的了解把握。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表现出非常鲜活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与中国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关系极大。这使我们能够从更为丰富的角度来观照文学，丰富文学，激发出文学自身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但是，文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存在。它不是仅仅具有自足的意义，还具有更为丰富的价值。这种价值除了文学自身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学将塑造什么样的情感状态，将通过人物的行为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它是否表现了一定时期社会的深层结构及其变化，是不是揭示出了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性等等。因此，我们看文学，要走出文学来看，要在对文本充分了解掌握的基础上，努力发现作品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观、情感状态以及对现实的关注。一段时间，人们不愿意讨论文学的社会文化价值。也许这种思潮是对把文学政治化、工具化等非文学化的反对，是特定时期文学回归自身的一种表现。但

是，就今天来看，我们又使问题走向了另一方面，那就是漠视或者回避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进而诱导文学脱离或疏远了现实生活，使文学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文学”，或者仅仅满足于表达个人生活的文学。对现实的回避将导致文学的虚无化，导致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疏离。也就是说，文学将被人民所边缘、冷落。文学的发展进步当然包括其文体的新变、结构的创新、语言的鲜活、新类型的创造等等。没有这些就没有文学。但是，文学的价值还体现在对现实人生的关注程度、表现深度，以及能否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资源、价值标准、情感意义，对社会未来的把握等等方面。这不仅因为文学要表现人的生活、情感，也因为它的实现对象是社会生活中的人。这才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也正因此，要求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人要比创作者更为深刻地关注社会现实、了解社会现实。一个作家需要从细节的层面来了解社会生活。而一个批评家则更需要从规律性的层面来把握社会趋势。作家是从个人—形象，以及细节—典型的层面达到规律性的把握，而批评家则需要从规律性返回个人与细节。为此，我们的批评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了解掌握基本的文艺规律的同时，还必须对社会现实有深刻的认知，需要更多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正如恩格斯在讨论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巨人的出现时所言，之所以在那一时期需要并且也出现了巨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才能为人自身的最终解放找到现实的支点。

三是要在保持批评科学性的同时努力表现出批评者自身的生动性。批评就是批评，必须对作品以及创作现象提出符合实际的意见。批评除了要揭示作品的长处、不足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指出其蕴含的价值选择是否正确。批评仅仅讨论作品的特色是完全不够的。当然，如果我们在批评时对作品的艺术特色毫无认知，没有对艺术表达的敏感性，甚至企图回避对艺术特色的分析也不是文学批评，而是一种社会学批评。因此，批评首先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不为人情、功利所左右的科学精神。要直指作品文本的内里，褒贬优劣，鞭辟入里，表现出凌厉生动的品格。但是，批评也要追求批评的鲜活性、生动性，追求批评者的个性。把文章写得死板教条，一副八股相，靠掉书袋来显示学识的广博，抄名言证明自己的强大，读不懂来表现观点的深奥等等都将泯灭批评的意义。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批评，要有文学

的特质。那种鲜活的、充满个性的、富有抒情色彩的表述总是显现出批评者的才华、人性、情调，并给予读者以阅读的快感、思想的享受、审美的愉悦。在这样的批评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批评者的情感，批评者的人格，感受到批评者发自内心的真诚，进而感染读者、吸引读者。这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是非常需要的。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生着急遽变革的历史时期。一切均需在继承的同时重新构建。社会结构正在重组，这种重组是如此剧烈，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到其在时代的长河中哗哗作响。经济模式也在新变，这种变化是如此迅猛快捷，以至于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一个事物存在的基本状况就被新出现的更新的事物所取代。而我们的文化——文学，也正在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将是与时代同步的，是时代的新生儿，十分需要理论的支撑、批评的引导。谁让我们正身处于这样一个变动不止、日新月异的时代呢？这是我们的幸运，是我们的机遇，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恩赐。我们不能辜负这样的时代，不能在时代的召唤中背过脸去。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时代的潮流中奋勇搏击，大显身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文学的进步贡献力量。

2016年9月15日

批评需要方法的创新，也需要学派

——读《交叉小径》

董大中

梁静的名字我是第一次看到，它跟《交叉小径》联系在一起，一本新出版的书。随便挑了几篇来读，就形成了这个题目。再读大部，验证我的看法，觉得可以成立。

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新人。我不知道她以前写过什么。这一本，初以为散文，却不是散文，是批评。她把批评写成了散文，或者说，是用散文笔法写的批评。又没有通常批评那种指手画脚的味道，甚至你不会感到作者是在批评，它是在你不经意间向你展开批评的翅膀的。当然，更没有我们大半生所习惯的主题如何、人物怎样、情节何等样曲折等等那一套。她是在跟你谈话，说她的感受，说她心理活动的过程。无论千字文，也无论像谈《妇人》那样比较长的篇幅，都是这样。作者对她读过的东西，看过的东西，有自己的见解，有全面的把握，她把客体跟她的主观感受融合为一。然后坐下来，不慌不忙，像剥竹笋，又像数豆子，把她的感受一样一样悠悠道来。她不着重说你的作品，她着重说自己。我想，这种批评可以称为心理体验的批评。作者善于思考，又有女性的细腻，这两点使她的心理体验细致入微。作者的文字功力不错，最难得的，是她不像留学生归来，把其他语言的一些特点，比如形态变化等等，生硬地搬用而来，加到我们汉语身上，使汉语受到严重污染，形成如瞿秋白等人早就指出的欧化，读起来别扭、难受。作者追求的文体风格跟她选择的批评方法相一致。有一处说到李敬泽：“这样的文字，最要紧的是读，是享受，是字里行间的轻松让你过瘾，读过就读过了，什么时候再翻起来，还会觉得很新鲜。”把这段话用在作者自己身上，我看也是适

合的。

我从90年代后期起，逐渐远离当前的文学，读批评和读创作都是零敲碎打，既不全面，又不系统。像这种写法，也许已经很多，但在我，在其他年轻批评家的文章中偶有见到，但不像读这本书感到新鲜。从这本书知道，李敬泽的文章就有相近似的风格。想来，这已是一股潮流，是适应着时势的需要出现的。

1928年胡适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总的精神是，在治学上“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他举中西为例，三百多年前的顾炎武、阎若璩所用的方法“同葛利略、牛敦的方法，是一样的”，但葛利略、牛敦使用新的材料，有了巨大的科学新发现，而中国的那些文人，却总是钻在故纸堆里，这些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强调了材料的重要，其实使用什么材料，也有个方法问题。胡适一向讲究研究方法，提倡实用主义就是胡适在这方面的一大功劳，他用这个方法取得的研究结果，许多结论，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把它推翻。胡适强调了材料的重要，从另一方面说明，方法的重要性是不容否定的。研究学问上如此，批评亦当如此。

近年读一些批评文章，固然过去流行多年的一主题、二人物、三情节等等的公式很少见到了，但是总觉方法陈旧，而且大体相同，相互之间，各种不同的报刊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1985年《批评家》创刊的时候，正是人们竞相介绍外国各种方法的时候，那一年也称为文学批评上的“方法年”。明年就是“方法年”的三十周年，恕我不客气地说，我看到的使用新的方法的论著不多。曾有人用过新的方法，比如有人用“叙述学”的方法研究赵树理，有人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研究鲁迅，但都是极个别的例子，书出版后，既没有人跟进，也没有人评说，显得十分寂寞。可见我们在方法论上，是比较迟钝的，敢于用新方法的人太少了。

读这本《交叉小径》，我看到一个新人，又看到一种新的方法。我隐约感到，在我们的批评王国里，可能会出现一个心理体验的流派。三十多年前，当人们大谈特谈“山药蛋派”的时候，我发出了“流派作家大都是二流作家”的怪论，表达了我对提倡流派的某种保留。我确实不太热心在创作上提倡流

派，因为在我看来这容易使一些有才华的作家为着加入某个流派而忽略了独创性的发挥。我以为，创作上的流派，采取自然主义为好，出现了就承认，就研究，而不需要鼓励，鼓励独创比鼓励流派具有更高的价值和迫切性。在批评上，我是希望有流派——以称学派为好——出现的，因为这象征着我们即使没有“百家”，至少也是有“家”、有派的。一言以蔽之，我的想法是，创作上不鼓励流派，容易形成“百花”，相反，批评上要出现“百家”，却需要鼓励流派。批评本来枯燥，如果批评文章千篇一律，那人们谁还去读呢？提倡流派，是使批评千篇一律得以改观的一条途径。80年代后期，我曾设想推动从创作力构成上建立一个流派，不幸，那个时候我正酝酿研究课题转向，就把机会放过去了。现在读梁静这本书，好像见到一线希望，算旧事重提。

我对这位作者了解不多，可能属于“草根”一族。她现在只能说禾苗出土，能不能够长成一棵大树，还有许多因素，还要靠今后的努力。我以为，作者最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艺术价值评价标准。这一点，是任何批评家都不能不有的，也是从事批评工作之始就要解决的。只有这样，才容易把好秤砣，也能够前后如一。我偶尔读到的一些批评文章，缺少的似乎正是这个价值评价标准，因此是一个普遍现象。同时要有一个好的参照体系，这个体系是世界性的，不是一国性的，更不是地区性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分到合、由疏到亲、由远到近，最后实现大同的过程，建立统一的“世界文学”（马克思语）未必需要，但是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必将是世界性的，人们评价文学也必将运用世界性的眼光。只有把你所观照的作品放到全人类的文学星球上去看，才能看得准确。如果局限于一个地区，那就可能把核桃当足球踢。

本文提出的这个想法，就是批评需要方法的创新，也需要流派——学派，是一件大事情，不是某个作者一个人的事，是一代人的事。

2013年4月17日，三闲居

目 录

卷一

- 在大洋彼岸哭泣的《扶桑》 / 003
- 有“奴隶的母亲”，才有《秘密的女儿》 / 011
- 我是女人，但首先是人 / 019
- 《妇人》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 023
- 班婕妤是宫怨诗人，还是女权主义先驱？ / 031
- 侯虹斌，一个主动在写的女作家 / 034
- 夫贵妻荣对女性来说有用吗？ / 037
- 问题少女的爱情一定就得是悲剧？ / 041
- 只有性话语才能颠覆男性叙事中心？ / 046
- “州官放火”的世界，小女子“点灯”无妨？ / 051
- 有一种青春文学叫笛安 / 058
- 为什么说《东霓》超越了《西决》？ / 061
- 菩提树下的精神乐果 / 065
- 我看韩寒 / 069
- 李骏虎印象记 / 071
- 《水浒》怎么新说？ / 074
- 《小春秋》里的大智慧 / 077
- 《教授》是一把随时扣动扳机的枪 / 079
- 真爱的唯一版本是《非诚勿扰》？ / 082
- 支撑基层女作家文学梦的是什么？ / 085

一笔一笔打捞平凡	/ 092
女性写作者怎么摆脱小家子气?	/ 099
文学是一剂解救灵魂的良药	/ 105
幸福何以抵达深处?	/ 107
搭上“60后”的列车看中国	/ 109
王艾甫送阵亡通知书的时候在送什么?	/ 111
非虚构+小说=非虚构小说?	/ 113
纷飞的理想中现实并不骨感	/ 118

卷二

母爱之重,何以安放?	/ 129
和魔鬼争夺未来的“人类之光”	/ 132
大屠杀之后的卢旺达还需要上帝吗?	/ 136
小说还能跑过影视剧吗?	/ 140
有一种女性叫性工作者	/ 143
《失踪女人》丢给知识分子一个问号	/ 147
《金婚》的生育观还不够荒谬?	/ 153
《蚂蚁》的归《蚂蚁》,贾樟柯的归贾樟柯	/ 156
歪歪扭扭的路上我们在狂奔	/ 159
和珅聪明吗?	/ 166
能进入摄影史靠的是什么?	/ 169
摄影与文学,融合是可能的吗?	/ 175
能让人读懂的摄影就是好摄影?	/ 178
摄影批评能否助推摄影市场化?	/ 181
摄影批评需要更多介入	/ 186
在大公和私欲之间隔着什么?	/ 190
《孝义千秋》,自我追求与超越的结晶	/ 193
皮影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 196
女性的被损害仍然是这个时代的痼疾	/ 199

卷三

易中天先生的“瓦锥”里包括女人吗? / 209

尊重女权就是尊重人权 / 211

女性文学怎么写史? / 215

上坟这事和女性有关系吗? / 218

谁说贤妻良母就是好女性? / 223

学会尊重女性就那么难吗? / 225

铁饭碗男少女多,因为机械执行“不得有性别歧视”? / 228

批评是一门手艺活儿 / 233

附录一

女性主义的讲述 张锐锋 / 239

附录二

大情怀:女性主义者的视界与精神 马明高 / 241

附录三

梁静:女性世界里的精彩跨越 武凌霄 / 248

后记 / 251

卷

一

